



编者的话：日前，淮南市社科联组织召开安徽省社科奖作品《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研讨会。该书由淮河地域历史文化研究学者、凤台县融媒体中心主任孙友虎创作，以宋代名相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为中心，在北宋历史视野下展现了吕氏家族的家族文化、家风传承与家国情怀，是研究北宋早期社会状况的重要文献，也是研究淮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史料。2022年获得安徽省社科奖二等奖，是淮南市历年来参评获得的最高奖项。现摘要刊登部分专家学者发言，以飨读者。

行止无声鉴青史 淮上人杰自风流

——《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读后

姚尚书

孙友虎《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荣获安徽省社科奖二等奖，令人欣慰，令人鼓舞。作者十年磨一剑，出鞘剑光寒，获奖当是实至名归。这一殊荣是多年笔耕的回报，也是淮南文史工作者的骄傲。行止无声鉴青史，淮上人杰自风流。《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撷取大量史料，旁征博引，聚焦并丰富了吕氏家族与同时代豪俊之间的人物关系，为研究吕氏家族文化现象以及北宋历史提供了有力佐证。其文化价值、文献价值、学理价值值得关注。

首先是文化价值。吕氏一门三相从宋太宗到宋哲宗，影响一百多年。北宋960年建立，1127年终结，前后长达167年。吕蒙正980年拜相，1011年离世，历时31年，是宋太宗时期著名宰相。《宋史》称他“质厚宽简，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论时政，有未允者，必固称不可，上嘉其无隐。”宋太宗对他评价很高，说：“吕蒙正气量，我不如也。”吕夷简是吕蒙正堂侄，1028年拜相，1044年离世，担任首辅时间不算很长，但其品行才能获得宋真宗、宋仁宗的首肯。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称他“当国柄最久，虽数为言者所诋，帝眷倚不衰。然所斥士，旋复收用，亦不终废。其于天下事，屈伸舒卷，动有操术。后卒配食庙庭，为世名相。”宋仁宗评价说：“安得忧国忘身如夷简者！”吕公著为吕夷简三子，1086年宋哲宗举他与司马光一同辅政，1089年离世。宋神宗称他“其言不欺，如权衡之称物。”

在政治文化上，吕氏家族秉承杯酒释兵权之后注重“文治”，对文化以及文化人的倚重，形成一种文化伦理；政见相同，则登庙堂之高，政见不同，则处江湖之远。尽管如此，不加刑戮。

这种政治伦理，是中国王朝政治中独特文化现象。而吕氏家族对北宋朝廷这种政治伦理的成型所起到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既重文治，必然抑制武功。朝廷裁减军力，弱化边备。在具体施政中，贯彻向辽人西夏政权纳岁贡，通过“转移支付”以换取承平的做法。吕蒙正、吕夷简在朝堂以及奏折中对养兵和“转移支付”进行过测算和论辩，结论是相比而言靡费大减，转移支付是划算的。在理学传播过程中，吕氏家族贡献巨大。北宋终其一朝对吕氏家族是信任、倚仗的，足见吕氏家族文化对中国历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其次是文献价值。就体裁而言，编年录与年谱有异曲同工之处。记述内容主要包括人物行止、著作、人际关系、社会背景等。记述单一的历史人物，通常称之为年谱；记述某一类或有关的数个历史人物，则称之为编年录。《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兼有资料性与史料考辨之长，其文献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作者征引了正史以及正史之外大量的文献资料，通过持续不断的认真采撷，汇编了海量的资料长编，在此基础上集中笔墨，以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的生平行止为基线，通过与他们过从甚密的相关人物行止相补充，填补了文献断点，校订了相关讹误，形成了系统可信的主体资料。形成书稿以后，又经过了时间的沉淀，在进一步搜集资料的同时，认真进行删削或增补，数易其稿方始定稿。书稿送交出版社以后，又经过反复修改打磨，消除了某些不经意的错误，成书质量非常之高。可以说，围绕宋代吕氏家族，尤其是吕氏家族中的代表人物行止进行常见资料全部“一网打尽”；不常见的资料也进行了认真搜集，与正史等可信资料

潜心文史研究 弘扬传统文化

——《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品读

方川

孜孜不倦，水到渠成。孙友虎长期致力于文学写作，创作诗歌、散文，出版有诗集《感觉空间》《菱形》（合集）；文化随笔集《解读蔡史》《好久不久》等等。出于对丰腴的地方文化钟情与热爱，他以文为史，右手文学创作，左手地域文化研究，在地域文化的世界里勤奋耕耘、遨游探索，不断地撰文出书。二十多年里，他陆续出版了《豆腐文化概观》《大清名宦李兆洛》《戴面具的军阀——苗沛霖和他的“天顺王国”》《问道淮南》《淮上史痕》《淮域名醋·安徽顾桥醋》等书籍。

这一系列图书的编写出版，训练了孙友虎的语言表达能力，提高了学术眼界，锤炼了学术研究品质和意志力，树立了自己的文化自信与学术自信，于是他开始向新的学术高峰攀登迈进。他秉承“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古训，孜孜不倦地熬夜“爬格

子”，水到渠成，最终完成了这部洋洋洒洒50余万言的《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

锲而不舍，创新创造。《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是一部编年体与年谱体史书的融合创造。中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相传是孔子编订的《春秋》，如果从鲁哀公十四年的公元前481年计算，至今已有2503年历史，中间诞生了诸如《左传》《竹书纪年》《资治通鉴》等无数编年体杰作。年谱一词起源于汉代，《汉书·艺文志》就有《古来帝王年谱》的记载。年谱经过魏晋南北朝发展，唐代趋于成熟，出现《刘氏行年记》以及《长庆前后集》的白居易自编年谱。宋元明清之际，年谱成了常用的史书体例。《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以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三位宰相为谱主，从公元946年吕蒙正诞生年开始记述，到吕公著1089年去世结束，共

143年的历史变迁。作者在“凡例”中指出：“以时间为经，以人物为纬，全面叙述谱主行迹及与谱主关联者的情形，辅以国事、家事、天下事，补选举、宰相、政策、民生、亲友、家族等话题，呈现谱主成长环境，反映丞相之殊异、宦海之关联、个人之价值。”通过谱主的人生活动轨迹、错综社会关系、生存社会环境与时代背景，全面展示北宋社会的整体风貌。从这一点上说，《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就是北宋早期一部独特的断代史。

严谨规范，功力扎实。《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不是单纯的史料汇编，在关键性记述中，都会加上作者的思考与解读内容。这部分内容，写作起来最艰苦，也最见作者的整体修养、史学积累与学术眼光。按全书50万言计算，初步估算这部分应该占到全书五分之一左右，差不多8至12万字

不负青山史海游

程晋仑

人们看来，完全是自讨苦吃，颇划不来，如非兴趣使然、志向使然、责任使然，能耐住寂寞，忍受孤独，守住初心，埋首史册，何来今朝？其三，这是一次功德之举。系统梳理挖掘出的宋代吕氏家族相关史实，无论是对今后淮南地方历史研究，展开文艺创作，还是进行深度创意产品开发、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等都是一项筑基工程。更为可贵的是，其不仅是相关研究工作的参考，也是普及地方历史名人事迹和家族家风传承的文献式史料。

二是可贺。原因在于：第一，其是淮南社科史上的大事。此书在高手荟萃、名家如云、精品众多的全省社科类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由省府评定的二等奖，开创了淮南社科工作先河，成为淮南社科史上亮丽的一页。第二，其是研究淮南人文上的大事。

最突出的亮点之一，治史者必先识人、辨人，这是价值判断的基础，也是史书褒贬的依据。人们推重人物年谱，是因为从年谱中能够获取有用资料。编年与纪事本末相结合是融会资料的最佳方法，必须予以充分肯定。第二，《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将推此及彼、连类而及的细节处理方法运用到。重要的历史人物是同时代的重要坐标，围绕这一坐标，许多相关的事件与人物次第展开，相互弥补，相互印证，是治史者常用手法。编年录自然离不开这一方法。作者为了说明某些历史细节，表述历史观点，坚持这一手法的作用，在编年录里出现了同时代的许多人物，人物关系的表述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历史细节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第三是文献、文征各有层次。文献与文征为治史者最常用，无论是同源互见，还是异源互鉴，对于展开历史叙事都具有直接作用。《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在使用以及处理上都特别讲究。特别是一些史料的辨析，本身就是文献与文征相互印证、互为表里的结果。第四是坚持开放的研究方法。《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准备工作很早，成稿后坚持打磨，加之出版社的从严要求，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本书体例的进一步完善。作者坚持兼听则明的研究方法，听取了不同的意见建议，为成书的高质量打下基础；在资料的搜集与考辨上，也是坚持开放的研究方法，成就了内容宏富的特点。

《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荣膺省社科图书二等奖，是对这部著述的肯定。它树立了一个坐标，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社科界特别是文史界同仁的士气。只要做好选题，坚持“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咬定青山不放松，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之间。孙友虎说：“本书凡有辨正，加注、按、考。”注、按、考，增强了本书的科学性、严谨性，提高了本书的可读性。比如967年，吕蒙正22岁“是年，吕蒙正居于洛阳东南之‘寒窑’”“是年，吕蒙正侍母亲，居洛阳之龙门利涉园土室，并开始苦读”。作者对吕蒙正入住“寒窑”的时间和寒窑所在地进行了详细考证。天圣三年的1025年，吕夷简47岁，“是年吕夷简次子吕公弼十九岁‘以水部员外郎即知庐州。’”作者以《燕冀治谋录》《宋史》《重修安徽通志》（光绪）为起点，参照《宋代官职辞典》《宋两淮大郡守臣易替考》《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会要》等文献依据，辨析考证了吕公弼是否知过庐州，以及知庐州的准确年份和时间跨度。通过《编年录》，孙友虎做到了胡适所倡导的“有三分材料说一分话”的严谨史学探索精神。

百年的宋王朝。比如作为吕氏后人，受家风家训影响，北宋名宦吕本中体味为官之道在总结家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第一次提出“清慎勤”的官箴，探索出一整套有关社会治理、官吏自律、为政理念等治国理政思想与实务韬略，开创了封建王朝清官理论，一直为后世景慕和仰奉，也为当今清廉淮南建设提供了一个历史镜鉴绝佳的学习范本。

三是可期。说可期是因为：一、河出伏流。以之为契机，受此鼓舞与启发，今后淮南将会有更多更好更优的文史资料得到研究发掘。二、春华秋实。随着淮南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相关工作有序推进，相关研究成果将会得以有效转化。三、日新月异。以之为风帆，汇聚形成一股涓涓之流，带动淮南社科工作上的新突破。

区域文化，显点为要。凤台处于“诸子”文化圈的辐射地带，北邻蒙城庄子，西接颍上管子，南有寿县《淮南子》。杂家始祖史游，曾是凤台城门的看守。作为县级区划，历史上时有中断，史料零散，缺少链条。其文化高地，以北宋为要，作为寿州和下蔡县治所，史载有知州80多位在凤台留下事迹，甚至诗文，如宋祁为寿州西园所写的序文和诗。加之，寿州吕氏家族发迹于此，更值得关注。这正是撰写《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书写寿州吕氏家族，特别是吕夷简、吕公著父子参与和拉动北宋政坛百年风云的内因所在。

机遇，与储备相向而行。我是新闻工作者，一直怀揣文学梦和史学梦。2005年5月，接待淮委唐言海、蚌埠社科联郭学东两位研究淮河文化专家到凤台考察，谈及花鼓灯和凤台人文镜象，他们建议我可从研究身边的文化做起，由点到面，不断拓展研究视野。此后，郭学东先生还相继推荐我参加由省社科联主办的第三届淮河文化研讨会和由安徽科技学院牵头的安徽蚌埠明文化研究会，促使我收集与凤台有关的史料，其中包括吕夷简、吕公著父子丞相的生平行迹。2007年8月10日至12日全国欧阳修文化学术研讨会在阜阳师范学院举行，我有幸应邀参加。我参会的论文是《论欧阳修与吕公著“讲友”关系之定位》。会上，对北宋文坛领袖、名臣欧阳修多有褒扬，对我的家乡人吕夷简则多有微词。这是历史的元角分，必须正视，毕竟《宋史》对他的评价比较中肯。父子丞相吕夷简、吕公著是北宋寿州（治今淮南凤台）人，而吕蒙正是河南府（治今洛阳）人，对寿州吕蒙亨、吕夷简父子的仕途产生过影响。苏象先《丞相魏公谭训》称吕蒙正是吕夷简的“伯父”，吕蒙正视吕夷简为“犹子”。“三吕”后世子孙关系交织，呈现家族、姻亲的关系网。撰写合谱，则便于了解和统筹分析当时的政治生态和发展环境。

全面梳理史料，走进历史现场。收集和筛选史料，大体包括简本、繁体本和本点校本等诸多版本的运用，重点把握“三个字”。一是力求“全”，收集《宋全文》《宋全诗》《宋全笔记》《宋史全文》《宋代诏令全集》等大全文献资料，以方志、文集及宋人年谱为补充，尽可能以宋代主要史料为枝干，并以元代以来的间接史料为线索进行溯源，拾遗补缺，形成翔实的证据链。二是力求“准”。编写年谱，以时间为轴，尽可能精准到日、月、季、年。对一时难以定论的，录下备考，力争不妄言、不武断。《续资治通鉴长编》《宋人日记从编》《宋会要辑稿》等资料，时间相对明晰，必不可少。身后的影响力以“编年后录”的形式予以呈现，以便准确定位。三是注重“考”。坚持原始材料与研究成果互证，利用安徽大学、安徽科技学院等电子查阅系统，托人查阅有关研究成果，兼收并蓄，补充、完善史链。依托宋代规制、笔记等资料，对吕蒙正寒窑所在地等进行考证，在比对中纠误、存正，从而理清史实。

北宋历史视野下的吕氏家族

方 胜

研究历史人物，治学由年谱始，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同。从帝王谱系、家族谱牒发展到个人的编年传记，年谱是一种颇具中国传统特色的文体。南朝宋裴松之的《裴氏家记》和唐令狐德棻的《令狐家传》算得上是年谱的远祖。《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是目前年谱著录成最高的著作，载录162部宋代年谱，其中11部年谱产生于北宋，最早为杨崇勋《白氏编年》，现存最早的则是吕大防所撰《韩吏部文公集年谱》《杜诗年谱》二种，而洪兴祖《韩子年谱》堪称成功之作。因此，年谱真正的起源应该是北宋时期，而大盛于清代。自清代以来，年谱体就备受重视，章学诚、梁启超等大力推举，胡适、钱穆、夏承焘、姜亮夫等大家亲自编撰了数量不菲的年谱。当今，年谱编撰不仅延续了近年来的辉煌，而且方兴未艾，呈现出勃勃生机。孙友虎先生《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秉持真实客观的原则，言必有证，以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三位谱主行迹为中心，在北宋历史视野下展现了吕氏家族的家族文化、家风传承与家国情怀。

第一，这是一部体例创新、真实客观、有生命力的年谱。英语chronological biography，可以是年谱，也可以是年表；本书题为《编年录》，实为年谱，而非年表。常见的年谱多为单个谱主，虽然何伦《眉阳三苏父子年谱》为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谱年，但毕竟是两代人，时间跨度要小很多；而《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将同一家族三代亲情的谱主放在一起叙述，跨越140余年，时间跨度大，写作难度可想而知。本书采用三代交叉关联的写作体例，颇为新颖，在谱主角色定位上突出针对性、关联性、全局性，以谱主行迹为主，以社会关系和环境影响为辅，呈现时代特质、个人价值，反映社会发展风貌。

真实是年谱的生命。年谱的主要特征就是真实准确和严谨客观，在叙述方法上，年谱不像传记那样可以由作者主观评判，可以用文学笔法。因此，真实的历史材料是年谱的基础。年谱的来源材料包括正史、笔记、野史、家谱、族谱等，尤其是地方志、族谱的褒扬文字和亲近人士的回忆、纪念文字，其中夸诞、虚饰的成分在所难免。这类资料的可信度是对年谱编纂者的一大考验。本书对于吕蒙正住“寒窑”、吕公著任职等考证，均体现了作者力求客观真实的严谨治学态度。

第二，这是一部资料丰富、剪裁得当、兼具专业性可读性的年谱。

梁启超认为年谱的优长是“将生平行事首尾毕见，巨细无遗”“年谱叙述一生事迹，完全依照发生前后，一年一年地写下去，不可有丝毫的改动”。在具体行文中，年谱的连贯性不但体现在事件的记录和梳理上，而且需要编撰者作综合判断，在逐月逐日的叙述中，顾及谱主的人生和思想变迁、性格变化。年谱如果仅仅是逐日罗列材料，便成了流水账，或所谓“烂烂朝报”。《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多方搜集材料，在编年中融合纪传的叙事手法，如同一种内容丰富、文体多样的传记。

该书取舍材料颇为用心用力。“三相”可述之事极多，而作者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为经纬，比较全面细致地叙述谱主由生到死的人生轨迹，兼及谱主家属、交游、后裔及时事等；本书就三位谱主的大事、要事做前后变化过程的完整叙述，或放在事件开始介绍，或放在事件结束时总说，有始有终，前后照应，既做到要言不烦，又不厌其烦。专业读者可以从获取研究资料，普通读者便于从中获取感兴趣的信息。

第三，这是一部展现淮南历史家族文化的力作。

有宋一代，吕氏家族风光无限，北宋时期60多人载入史志，其中最知名的是吕蒙正、吕夷简、吕公著“三相”均与淮南有着密切关联。吕龟祥是吕蒙正二叔，在寿州为官，并定居于此；吕蒙亨是吕龟祥之子；吕蒙正堂弟，自幼生活在寿州；吕夷简是吕蒙亨之子，生于淮南、长于淮南；吕公著是吕夷简三子，生于开封。本书谱主“三相”是北宋时期吕氏家族的杰出代表，从《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可以看出，他们为官“持正”，注重选贤任能，极具家国情怀，其家风文化从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成是淮南历史家族文化的缩影。

传递家乡情怀

《北宋吕氏家族“一门三相”编年录》创作动因及经过

孙友虎

汇聚书写动能